

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

——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王 磊 王 跃

内容提要 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经验中的通例,亦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导致在西方被证明是成功经验的社会中心主义阶级建国和国家中心主义军政集团建国之路在中国走不通,近代中国走上了一条政党中心主义建国之路。在应对民主政治这一政党建国的挑战上,中国国民党使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双重困境,两次葬送了主导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机遇。中国人民最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化的新型民族国家建构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建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任务的初步完成。

关键词 民族国家 历史主题 政党建国 民主政治

王 磊,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10023

王 跃,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10023

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又称国族国家,是产生于西欧,后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架构,泛指在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内,以国族认同为基础,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以民主政治为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不仅是近代以来国家制度变迁的目标形态,而且事实上构成了当今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为避免沦为新兴民族国家殖民地的厄运,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近代中国以建构主权独立、国家统一、国族认同、中央集权、政治民主的民族国家为历史发展的主题。辛亥革命的胜利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王朝国家的演进轨道,开启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新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建构任务的初步完成。与此同时,围绕如何建构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主题,20世纪的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客观上形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观念成长的历史和逻辑研究(1921-1949)”(项目号:16DJC001)和南京师范大学“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宁师人[2016]34号)阶段性成果。

一、民族国家建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明晰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是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的主题,简单来说,是指民族和国家的自然历史发展到该阶段正在面临和应该解决的中心任务和主要问题,它决定并代表着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和方向;主线,是指贯穿于一定历史阶段民族和国家整个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对历史发展实然和应然的高度概括和抽象,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一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符合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但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具体实际和彼时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差异,也会出现历史发展主线与主题不符的情形,即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以为,建构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要是以下三个核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趋势。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中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近代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飞跃发展,使得传统的封建式的所有制关系日益“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1]。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世界进入“资产阶级时代”^[2]。随着资产阶级反对王朝专制主义斗争的深入和不断胜利,其面临的将那些“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国家^[3]的任务逐渐得到解决,建构以民族(nation)对国家(state)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随之成为“世界历史经验中的通例”^[4]。而对于那些后发国家来说,“要么迅速地演变为民族国家并成为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员,要么继续维持原先的国家形态而徘徊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之外,甚至沦为民族国家的殖民地,受苦于统治和压迫”^[5]。因此,就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避免沦为列强完全殖民地厄运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构独立的民族国家。

二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规定。主要矛盾贯穿于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始终,支配、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并决定了该阶段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从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任务是结束国内各民族间的松散局面,最大程度地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普遍认同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筑成对外反抗外族入侵、对内推翻专制压迫的新长城,将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国族认同,最终“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6]。

三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对于建构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望。早在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大量传播民族主义学说并提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时代号召。维新派梁启超明确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革命派亦以“创立民国”为行动纲领,主张将中国“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8];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同样视“建设劳动阶级

[1][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第32页,第36页。

[4]《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5]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7]《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页。

[8]《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5页。

(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而到了19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国家建构更是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愿望,蒋廷黻甚至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2]。

总之,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规定以及先进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共同决定了民族国家建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为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主题,近代中国维新派、革命派,知识分子以及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现代政党等主体纷纷觉醒,展现其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同理念、态度、设计和努力,各主体民族国家观念的萌生和变迁构成了人们的观念成长史,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取向、建构方式和行为选择。各主体民族国家建构观念生成、流变以及实践上的展开事实上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二、政党建国: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选择

建构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主要课题,然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在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组织民族国家尤为艰难。为实现此目标,世界范围内主导制度变迁的三种支撑性主体——资产阶级、军政集团和现代政党,无一例外地在中国舞台上竞相登场。然而,以辛亥革命为开端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表明,在西方被证明是成功经验的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建国之路和军政集团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建国之路均以失败告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政党中心主义建国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缘由:

首先,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成功转换,之所以会形成三种不同的支撑性主体和三种不同的建构模式和路线,“在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3]。英国等国资产阶级阶级革命的建国路线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在英国等国家的传统社会里孕育和“兴起了一个有着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摧毁了来自既往的对于民主资本主义的种种障碍”。在资产阶级阶级力量的主导下,英国“扫除了内部阻碍贸易的障碍,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现代货币制度和其它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现代型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诞生了”^[4]。对照英美成功经验,中国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外部的殖民侵略和内部的传统包袱,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不仅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生的力量软弱分散,而且造成各派力量长期不能统一。中国革命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支类似英美等国那样独立的统一的政治力量充当革命的领导。虽说就结束清王朝专制统治来说,革命派起了重要作用,但与其说清王朝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其自行垮掉的,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北洋军队全力支撑清皇朝,革命军队将不是它的对手”^[5]。再者,就资产阶级代表势力中国同盟会来说,长期的四分五裂削弱了其本不强大的实力。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这种实力不足的本质很快暴露出来。严重的渗透危机和致命的财政危机,造成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尽管革命派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开端,但这仅仅就是个开端,没过多久,其胜利果实便成为袁世凯集团

[1]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3页。

[3][4][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2页,第23页。

[5][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的囊中之物。

其次,以德日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同样完成了向近代的转变,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尽管资产阶级自身力量并不强大,但却选择了依附于那些对发展资本主义有着强烈愿望、具有一定实力的军政集团,形成了以军事领袖为主导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力量。在这些国家,“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1]，“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2],从而成就了世界范围内制度变迁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路径。近代中国同样出现了军政集团建构民族国家的尝试。来自各方的有利条件,如革命派力量的软弱分散、国内外势力的普遍支持等造就了袁世凯成为民初主导中国国家建构的人选,但最终却走向了失败。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自晚清以来一直未得到解决的权力危机在袁世凯政府那里同样存在,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对政权的有效掌控,而中央政府力量的式微又进一步恶化了社会形势;另一方面,作为领袖的袁世凯对民族国家建构理解和观念选择的错位。这位传统的旧式官僚,尽管在清末新政中有着突出表现,但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利用等所作所为,并不在于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和追求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特别是在面对长期存在而又无法解决的权威危机时,其将目光不得不转向传统的权威基础和象征方式。但问题在于,经过多年民族国家观念浸染的中国,作为传统权威基础的孔儒经资产阶级的鞭挞,并不足以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支撑权威。背义卖国的负面形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的合法性基础,再加上彼时中国政治动员的深入,共同埋葬了袁世凯的帝制梦,近代中国军政集团建构民族国家尝试同样走向失败。

第三,政党建国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选择,不仅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即资产阶级和袁世凯军政集团先后失败的事实,使得中国社会不得不另行寻找新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支撑性主体,而且符合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和经验逻辑。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由于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资产阶级无力担当领导国家建构的重任。在这些后发国家里,除军政集团外,先于民族国家存在的政党凭借其高度组织化、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精干的人才队伍,亦可充当组织领导国家独立、统一和发展民主的支撑性力量。历史表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3]。而且就世界范围内来说,政党成功主导国家建构同样有经验可循,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不仅保卫了无产阶级政权,而且重建了国家秩序。重要的是,1920年代的中国事实上进行了一次政党建国的成功实践,即在苏俄和共产国际帮助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取得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决定性胜利。如果排除阶级的因素,仅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来说,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混乱,东北易帜的实现标志着国家完成了形式上的初步统一,此时的中国无疑是继袁世凯之后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机遇,集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亦可成为弥补中国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裂痕的强有力人选。但给国人带来许多希望的国民党很快就遭到各方质疑,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没有实现对近代中国政党建国关键挑战的有效应对。

三、主权与民主:中国政党建国的关键挑战与国共两党应对

虽然从整体上来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是民族国家建构,但作为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阶

[1][2][3][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第169页,第341页。

段,近代中国本身又是由多个短的发展阶段组成,具体到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和民族面对的主要任务和关键问题又各有侧重,故而对于建构主体来说,不同时期的民族国家建构任务以及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观念认知,也相互区别。

我们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段时期,构成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阶段。一方面,进入1920年代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历史性地转移到了现代政党身上,中国进入政党建国时期;另一方面,从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性任务来说,这一时期的关键在于推翻北洋军阀统治,重建社会秩序,结束国家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完成国家统一。宁汉合流后,以国民党为主导,中国基本实现了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完成国家统一等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性任务。在此之后,能否逐步实现国家主权独立、有效发展民主政治成为执政后的中国国民党民族国家巩固的关键挑战。事实上,面对争取主权独立和发展民主政治两大挑战,国、共两党均作出了应对。但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证明,国民党在发展民主政治问题上使自身陷入了双重困境,结果葬送了主导民族国家建构的机遇。最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任务的初步完成。

首先,就争取主权独立来说。主权独立是民族国家建构和巩固的前提。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这一任务贯穿民族国家建构的始终。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共自成立以来不变的主张,而且影响了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除列强”亦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两大目标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北伐期间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数年,国民党确实做了不少恢复中国主权的努力。国民政府在收回部分租界、废除和修订包括领事裁判权等在内的不平等条约等争取中国主权独立问题上是有作为的。

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近代中国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性历史主题。虽然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包括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在内的多次抵抗日军入侵行动,但整体上来说,直到蒋介石庐山谈话前,国民党并没有将主要精力和矛头对准日本侵略者,故而这一时期其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把握是失误的,失掉一部分民心也是必然的。然而,1937年7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经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宣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立刻赢得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民众的一致响应,蒋介石本人亦成为公认的领袖。事实表明,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抗战胜利,包括国共在内的中国境内各党派,只要在观念和行动上坚决抗日的,皆顺应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潮流,自然也会最大程度地赢得民心、获取支持。

其次,就发展民主政治来说。1927年执政后的中国国民党,其政制设计基本延续了孙中山的生前设计,即“一切建设的方向,就是要把建国大纲整个地实现出来,一切政治制度,必须以建国大纲为基础”^[2]。众所周知,《建国大纲》对国家建设的制度安排,以“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为核心。客观地说,孙中山对国家建构三阶段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有其合理性,即试图通过军政结束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局面,建立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继而通过训政提升人民参政能力,最后通过宪政确立民选政府。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设计又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寄希望通过以国民党为核心的集权主义政治方略实现自由民主的宪政理想,使理论自身陷入困境。重要的是,在实践上,尤其在训政这一中间环节的实施过程中,国民党否认广大民众及其政治代表的参政能力和需求,将资产阶级民主

[1][2]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6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86页,第279页。

政治引上了专制集权的深渊,加剧了政制设计的矛盾。

我们以为,为保障国民党的阶级利益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运转,确立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执政后的国民党并没有有效处理国家建构中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相反,事实上否认和排斥了广大民众及其他党派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商人、士兵等在内的各阶级阶层被充分动员并加入到“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北伐战争和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来,事实上形成了各阶级阶层的联合革命。故而,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理应由各革命阶级共享。然而,事实上的南京国民政府却非如此,不仅没有扩大革命民众的参政范围,而且用各种方式打击民主力量,不仅不能容忍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而且连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势力,以及与这些阶级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也被视为障碍。与此同时,在理论上,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观在蒋介石的诠释下逐渐儒化和法西斯主义化,既否认人民民主,也不承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能够行之于中国。可以说,1927年后的中国政治逐渐走上了独裁的专制主义道路,抗战胜利后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非民主的政治发展注定得不到民众的坚定支持。最终,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于1927年和1945年两次葬送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性机遇。

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和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中国逐渐进入了共产党领导和主导的民族国家建构新时期。早在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就主张“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明确宣称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2]。为建设这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努力将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深入分析国情,逐渐得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知,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开展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本目标的奋斗任务,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3]。不仅如此,中共始终认为,民族和民主“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4]。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5]。

经过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最终走上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道路,形成了以阶级分析为基础、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认知。具体来说,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6],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7],其国体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而且认为,这才是中国“‘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8]。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设计和实践由于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和中国最广泛阶层的根本利益,自然也就得到了广泛支持,解放战争后期以民盟、民革为代表的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公开响应,并加入到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行列中,就是有力的说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1]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2][3][4][5][6][7][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第637页,第637页,第674页,第674-675页,第675页,第677页。

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华民族的新型民族国家理论和实践的胜利。之后经过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发展完善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认知,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新局面,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基础。

结 语

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近代中国的典型特征。无论人们对现代性作如何反思,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传播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建构,从根本上说,是进步的、不是落后的,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不是逆历史而为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样,“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1]。不管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持何种质疑和批评,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架构,产生于西欧中世纪晚期、经过近代欧洲的早期发展及后来实践,民族国家都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组织的最佳规模”^[2],事实上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即便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形式”^[3]。

为避免沦为老牌民族国家殖民地的厄运,近代中国必须以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为历史发展的主题。但不同一般的国情又决定了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建国之路在中国走不通,近代中国走上了政党中心主义建国的道路。然而发展民主政治的政党建国挑战让中国国民党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主导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使命不得不历史地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新型民族国家的正式建立。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对于中共来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方位巩固民族国家建构成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战略任务。作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与多个大国之间有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并且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大国,确保国家主权权益不受侵犯,打击“藏独”、“疆独”分裂势力,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任务依然繁重。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否进一步妥善处理各民族间关系,健康推进族际政治整合,进一步增强国民的“中华民族”国族认同,同样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巩固的重要考验。此外,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央权威,发展民主政治,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理顺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无不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难题。总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民族国家巩固和强化的任务一点儿都不比建构前轻松,进一步保障国家主权完整,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巩固国族命运共同体认同,增强中央权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任务完成的艰难程度前所未有,依然需要以创业者的毅力推进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强盛。

〔责任编辑:史拴拴〕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2][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21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郭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